

高等学校通用教材

理想光辉之路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

胡懋仁 主编



LIXIANG GUANGHUI ZHI LU
ZHONGGUO SHEHUIZHUYI DAOLU DE SHIJIAN HE LILUN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通用教材

理想光辉之路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

胡懋仁 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光辉之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胡
懋仁主编.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5. 2

ISBN 7-81077-625-8

I. 理… II. 胡… III. 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
国 IV. D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669 号

理想光辉之路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

胡懋仁 主编

责任编辑 杨叶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100083)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http://www.buaapress.com.cn> E-mail: bhp@263.net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 字数: 269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 500 册

ISBN 7-81077-625-8 定价: 17.00 元

前言

编写这样一本辅导教材,我们早已酝酿多年。在讲授《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时,我们经常面临同学们提出的大量问题,而作为教师的我们也在思考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要想比较恰当地予以回答也不能只是就事论事。从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中,我们常常感到,青年们由于对 50 多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缺乏具体的了解,很多认识都只是从一串概念转到另一串概念。因此,我们考虑从历史的角度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做一个大致的叙述,使同学们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过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能有个初步的认识。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充满辉煌和骄人成就的过程。这里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也有探索过程中的艰难和困惑。例如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今天究竟应如何认识?这不是单凭几个概念就能认识得清楚的,也不是可以草率下结论的。我们希望同学们通过历史来了解这些细节,而后再得出结论。再比如,“文革”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受到极大的阻碍,那么“文革”前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与成就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成就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一段时间里,有的人把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文革”前及“文革”中的失误进行简单类比,甚至用改革开放的成就去否定“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给人们造成历史断裂的印象,这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就开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文革”结束后,我们党无私而且勇敢地为我们曾经的失误承担责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去改正那些错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还在不断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和探索。直到今天,这个探索的过程仍然在继续。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进行理论的概括、总结、提高和升华,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主要代表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脱离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又不能离开正确理论的指导。这个相辅相成的辩证过程,就是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矛盾运动。丰富多彩的实践,为正确理论的形成提供养分和源泉;理论在对实践指导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完善、充实和提高。

我们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史的研究过程,也是我们进行理论探索的过程。在这里,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进程是一致的。理论的研究并不以理论自身为目的,而以指导实践为其最终的目的。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锻炼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能力,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学会善于运用理论,学会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还要学会用正确的理论来树立和完善自己的世界观。

当代青年既有着高昂的爱国热情,也掌握着现代的科技知识,满怀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的美好信念。然而,理论的指导是不可缺少的。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青年们一方面有着较强的个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自己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还很长,也许还很艰险,充满着崎岖和坎坷,但这又是一条充满着理想光辉的道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了几十年,今后还要为之继续奋斗下去。

这本辅导教材不是纯理论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具体实践的历史事实;同样,它也不是纯历史的,因为其中也包括一些理论的概括。这是我们编写此类教材的一个尝试。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体例,使学生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历史事实上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有个更全面的认识,其中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描述。我们希望同学们在使用这本教材时能有我们预期的收获。

本书由胡懋仁主编及统稿。其中由胡懋仁撰写的有开篇、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二章和结语;由田玉兰撰写的有第五章;由黄建华撰写的有第三章和第十章;由田真撰写的有第八章和第十一章;由姚小玲撰写的有第七章和第十三章;由彭付芝撰写的有第九章、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

本书由李志英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04年11月

目 录

开篇 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

开篇 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

一、中国的资本主义	1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5
三、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	7

第一篇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基本政策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基本政策	11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4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及其意义	16

第二章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

一、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施	20
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3
三、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27

第三章 党的八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果及苏联模式的缺陷	31
二、八大前的思想理论准备——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34
三、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决策	37
四、八大的历史功绩	41
五、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43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成就与经验教训

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45
--------------------------	----

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大失误	46
三、造成党的重大失误的主客观原因	49

第五章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

一、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主要政绩	52
二、广大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工作的肯定	55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反思	57

第二篇 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场革命

第六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先导

一、思想解放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9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62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63

第七章 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对国情的基本估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66
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73
三、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	77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实践	80

第八章 发展是硬道理

一、中国的发展战略	84
二、科教兴国	91
三、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	94

第九章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99
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02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形式	107

第十章 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内容和意义	111
------------------------------	-----

二、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117
三、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120

第三篇 新世纪的使命

第十一章 当今世界形势与格局

一、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124
二、科技发展的势头及其影响	126
三、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128

第十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132
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	137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品质	139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141
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45
三、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	149

第十四章 祖国统一和国防建设

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在港澳的实施	151
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继承与发展	158
三、祖国统一和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富强的必要保障	163

第十五章 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	167
二、党的建设的必要性和主要任务	169
三、党的建设要不断地与时俱进	170

结语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篇 社会主义是中国 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

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最近 50 年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着。尽管她历尽曲折，尽管她跨越了无数艰难险阻，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拦她朝着光辉的目标越走越近。

在她走过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时，有些人对这条道路指指点点，有些人说她不该走这条路，也许还会有更好的路可以走。但历史是怎样展现这样的历程的呢？

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观点：有人说中国缺少资本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补上这一课。也有人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某种偶然的选择。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根本没有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历史真的像这些人说的那样吗？

一、中国的资本主义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有些人的回答是它介乎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有人说它还是个有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总之，它与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我们从历史中的大量事实可以看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就没有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就是靠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资本主义外围及边缘地带的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才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不能仅仅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即发达国家自身的状况来认识资本主义，必须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资本主义。这自然包括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认识，否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就只能是片面的。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除了明末那一段时期之外，有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着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学者认为，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初步的发展，能够得到直接证明的，有这样一些手工业行业：制茶、制烟、制糖、榨油、制纸；江浙一带某些城市的丝织业；江苏某些城市的棉布踹染业；陕南一带的木材采伐业；广东佛山、陕南一带的冶铁、锻铁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北京西部和山东博山

的煤矿业；云南的铜矿业；四川的井盐业；以及上海的沙船航运业等。

这些手工业行业与欧洲市民社会早期的简单手工业协作十分类似，其中有些还发展成为工场手工业。这说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封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就有其必然性。当然，仅有萌芽还不能称其为完整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①

中国毕竟没有像欧洲那样，走过一条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历史迫使中国资本主义走的是另外一条畸形之路，这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道路。主要原因除了几千年封建自然经济及其上层建筑还比较强大之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成为中断中国资本主义自发发展的重要原因。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英国帝国主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体系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的打击还不够大的话，那么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英法联军长驱直入，进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逼得咸丰皇帝出逃热河。战后，清政府相继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破坏，国家主权进一步沦丧。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和通商事务。这也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发端。

即使是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洋务派实施洋务运动也是为了防止国家利益进一步损失。洋务派是从“师夷之长技”以“富国强兵”开始的。李鸿章说过，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洋务派感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中国缺乏先进军事装备，缺乏生产先进军事装备的现代工业。洋务派办学校，派出留学生，开办军工企业，购置洋枪洋炮洋舰，目的是在装备技术上能与列强并驾齐驱，以免再遭受列强的欺辱。这种官办的军工企业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其官办性质与衙门作风十分严重，但它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催化的作用。

不过，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像当时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走上一条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之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入侵和买办资产阶级附着其上这两者的干预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19世纪的70和80年代，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所导致的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者并存，中国资本主义也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在中国倾销，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主要从事商品输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引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117页。

出,1894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中,进出口业占36.8%,银行和保险业占33.9%,航运业占11.8%,制造业占12.4%,而制造业中又有80%是船舶修造厂和缫丝、砖茶等加工厂,也是为贸易服务的。^①

到了20世纪以后,外国资本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但它的大部分投资来源是在中国国土上积聚起来的,外国银行在中国吸收了大量存款,并发行钞票,用以支持外商在中国的投资。20世纪初,帝国主义者又直接掠夺中国的矿产和土地。日本原是个资本输入国,由于从甲午战争中获得中国的赔款,其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改变。1913年,日本在中国投资已超过4亿元,这个数字约等于它从中国获得的赔款加利息的总和。

外国资本首先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通过买办的商业网,支配着中国国内的商品流通。外国银行长期垄断着中国的外汇,并以雄厚的财力,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在铁路和轮船运输方面,外国资本占有85%左右的比重。

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关系。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依存。本国工商业,除了在竞争中受到外资剧烈的排挤外,另一方面,在机器设备、动力和某些原材料方面依赖于外商。有些企业就是专为替外商加工或为推销外商商品而开设的。如果没有众多的华商工厂和庞大的商业网,外商企业也不能单独存在和发展。

与外国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的是买办资本。买办资本是依附于外国资本即帝国主义的,低级的买办为外国资本推销商品和采购原料,高级的买办为外国资本保障投资及获取政治上的特权。这样,一部分高级的买办资本又与官僚资本融为一体。洋务运动的结果是买办官僚化和官僚买办化。买办从外国资本中获得的佣金非常可观,成为官僚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僚资本源于洋务运动时开办的军工企业。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洋务派企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又继承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由此,官僚资本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②

官僚资本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它具有买办性,承担着为帝国主义列强保障其政治经济利益的任务;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封建性,与封建地主阶级联合在一起,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进行多方限制和刁难。^③

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双重挤压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就十分艰难,但由于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毕竟还给民族资本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自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在民族资本创办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有18.3%是商人,24.8%是买办。事实上,投资近代企业的地主,都有一定的官僚背景或身份,很多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极少数是土地主。他们投资近代企业后,并没有放弃土地经营,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引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130页。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引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131页。

③ 许涤新:《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引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35页。

有的还扩大了土地经营。因此,早期的民族资本与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1895至1913年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初步发展。它首先受甲午战争的刺激,引起了一股投资高潮。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举国震动,设厂自救的呼声遍及海内,同时引发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清政府虽然镇压了维新派,但又不得不放松对民间兴办实业的控制,实行某些提倡工商业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使中国独立自强,挽救民族危亡,只能依靠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在实际上,外国资本在这段时期发展得更快。而民族资本的发展在遇到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受到很大的冲击。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很有限,投资增长的速度也较慢,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则较为迅速,这就是说,这段时间内,中国资本家增多了,产业工人也增多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各生产部门中扩大了,在地域上也有所扩大。^①

抗战胜利后,中国官僚资本发展极为迅速,除了一部分来自没收的日伪资产外,美国资本的侵入加速了具有买办性的官僚资本的膨胀,同时,官僚资本还借机把国家资本纳入到官僚资本的控制之中。民族资本在这段时期发展更为艰难,除了遭到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排挤之外,资金短缺、税负沉重、通货膨胀等恶劣的经济环境,也压得民族资本喘不过气来。

毛泽东1939年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有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前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②

综上所述,中国想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走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在外来的帝国主义和内在的封建势力的勾结和双重压迫下,是很难走通的。这也表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特殊的部分和地位。所以,前面提到过的某些认为中国需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的观点是缺乏依据的,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中国是怎么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呢?这条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是历史在中国发展的趋势还是如某些人所说,是个别人头脑发热、心血来潮的结果呢?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引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134—136页。

^②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590—591页。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历史的进程总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没有纯粹的必然,也没有纯粹的偶然。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大量偶然事件的背后,总有必然性在起主导的支配作用。这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在外在表现上似乎有一系列偶然性在起作用,但其在本质上则有着某种必然性。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不例外。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人对国家的贫弱深感痛切,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在民间此起彼伏,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为了免除再受到列强对中国权益的侵害,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然而,洋务运动中的主导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他们愿意借助国外的先进工业技术和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但他们不愿意改变封建统治的根本状态,不愿意触动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必然悲剧。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战败赔款割地,举国震动。洋务运动也最终宣告失败。

民族资本在这段时期的兴起,为了自身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就要有所要求。但由于他们与封建势力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幻想通过变法、维新和改良来解决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们幻想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实施类似“明治维新”式的变法,既不触动封建制度,又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道。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很微弱,加之他们是孤军奋战,对封建顽固势力又充满着幻想,因此戊戌百日维新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依靠洋枪洋炮和变法维新以富强中国的幻想破灭后,中国的资产阶级转向走一条革命的道路。他们希望通过走一条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辛亥革命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由于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仍然与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很微弱,由于地主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一部分人投机革命,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投机革命的封建势力妥协,因此,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这并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坦途。帝国主义决不肯允许中国走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起来,为了帝国主义自身的利益,势必要让中国继续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没有丝毫的改变。虽然中国资产阶级很希望走上一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他们的目的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必然付之东流。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宪法到政体,完全模仿西方主要民主制国家的模式,希望通过这样的政体模式来保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北洋政府的国会是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确立的。第一届国会成立于1913年4月

8日。根据《国会组织法》，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总计议员870人。其中参议院议员274人，由各省省议会，蒙古、西藏、青海、华侨选举会，中央学会按定额选出；众议院议员596人，由各省人民按每80万人选一人和蒙古、西藏、青海与参议员等额的原则选出。但由于当时人口未及普查，各省名额的分配，实际是以前清咨议局额数的三分之一为标准的。

在北洋政府所在地北京，政党林立，知识分子以组党为时髦，而且许多名流还同时参加多个政党。梁启超同时参加3个政党，章炳麟参加了5个政党，伍廷芳则同时挂名11个政党。这就是当时模仿西方多党制的奇怪现象。

在国会中议员居多数的同盟会，也想依照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方式，以国会中多数议员所在的党派来组阁执政。当时宋教仁主持同盟会党务，力主政党组阁执政。当时同盟会正在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为了保证自己的势力在内阁掌握实权，则让多数阁员纷纷加入国民党。宋教仁让改组后的国民党掌握内阁实权的打算完全落了空。但袁世凯并没有放过宋教仁，他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这样，国民党内就再也无人力争什么政党执政了。后来，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后，大权独揽，完全取消了内阁。^①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虽是战胜国，但却要把过去由德国侵占的胶东半岛转交给日本。中国推翻了腐败的封建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繁荣。中国还是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

^① 袁继成：《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http://zhenyuan.sdedu.net/resource/gz/gzls/lsl/zlmgzdzds/21864_sr.htm

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综上所述,中国在近代以来,不是没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也是有着大量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这也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旧中国是不可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同时,中国走上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也不是纯粹的偶然,更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什心心血来潮的结果。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类似“五四是救亡先于启蒙,致使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需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中国要是早发展资本主义就早富强了”等似是而非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这些观点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从主观臆断出发。这里也不排除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恶意偏见对那些持有错误观点的人们的影响。人们如果愿意从实际出发,如果愿意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头脑来思考问题,那么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和真理性认识其实并不困难。

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资本主义阶段,但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既有其封建性,又有其资本主义性。它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也可以将其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形态,是帝国主义列强压榨中国人民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手段和工具。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先辈们,多次尝试要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破坏,再加上后来的由买办发展而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前两者相勾结,先辈们试图以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的愿望没能实现。这样,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使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的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肩上。中华民族实现繁荣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理想,就必然通过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实现。

三、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说:“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

^①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1358—1359页。

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非常明确了:通过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使命。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的政治路线,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后,党必然要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在实践中,要想顺利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却并非易事。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可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非常不足。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能来源于苏联的实践,即使如此,我们所了解的也还只是皮毛。我们对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没有把握,完全是一路摸索着向前走。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障碍,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也从来没有退缩过。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始终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她不会被任何困难吓倒;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她不断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她也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这为中国共产党人日后在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征途中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始终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正因为我们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领域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她不仅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能够不断战胜种种困难,克服自身的不足和缺点,敢于和善于纠正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始终不渝地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在红军内部要加强党的建设。在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种种不良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中肯的意见。这一思想,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建设。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清算。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提出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是建党以来在全党进行的最大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进行了坚决的清理和整顿,使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①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614页。

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党的三大作风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①党的七大,进一步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所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又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然而,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都会受到这个国家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会存在自身所独有的具体情况。这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否则就势必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僵化,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同时也就扼杀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中国的革命实践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毛泽东赋予“实事求是”新的意义,即“实事”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就是革命的规律性,“求”就是要我们去探索,去追求。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概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从本本出发,从理论出发的错误做法;还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错误做法。反对教条主义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而不是反对理论本身。企图用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错误做法,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时刻警惕的。

所谓密切联系群众,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不能脱离群众。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工作的具体方法都要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接触和密切联系,要在人民群众中坚持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法,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工作方法。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面前没有自己的私利,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和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此,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一条永远不能改变。没有这个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一切依靠群众,就是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任务的完成都要依靠群众。共产党人不是包打天下的救世主,共产党员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是很小的,不可能包办一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根本原理就是群众创造历史。共产党人的作用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积极地领导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说明我们为了群众的利益所制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案,都要经过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听取

①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994—995页。